以粟特胡人为代表的西域乐舞初探

刘 硕 （上海音乐学院 200031）

摘要：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在隋唐时期，文化包容并蓄，很多西域乐人来到中原，其中作为代表的就是粟特胡人。他们对于中原的贡献和影响在于服饰、音乐、舞蹈、诗歌等方面双向的融合汇集与交流互通。

关键词：粟特人；胡人；西域音乐；乐舞

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最繁荣和兴盛的朝代，同时也是东西方文明交织融合的纽带时期。丝绸之路的兴起，东起长安、洛阳，西经中亚，延伸至地中海沿岸地区，把唐代长安、中亚、西亚和东欧诸国联系起来。西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：狭义的西域一般指天山以南、昆仑山以北、葱岭以东、玉门关以西的地区；广义的西域则指中原西部边疆以西的所有地区，还包括南亚、西亚。在入华的外来民族中，粟特人因为经商、从政、从军等原因，纷纷进入中原，并带来了诸多文化艺术活动。

一、西域粟特胡人概况

唐代的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多样性，因此不少胡人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在唐代，据史料《唐会要》卷九中记载："康国人习善商贾，争分铢之利。"自汉代张骞的丝绸之路开通以后，昭武九姓诸国热衷于向中原民众引进流通大量的商品，从中获利。唐代的粟特人据文献记载，以国为姓，比较好区分，其中以康、安、米三国的姓氏为多见。[1]

"粟特"是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地区，隋唐时期，粟特人在河中建立了很多国家，例如：康国、安国、石国等，在中国的古代史籍中称为"昭武九姓"。入仕唐朝宫廷的外来族群，不只有西域的胡人，还有"东夷、南蛮、北狄、西戎"的齐聚。粟特胡人是最早一批仕族群体，从汉代开始即东来中原，魏晋南北朝时仍然延绵不绝，到了繁盛的隋唐时期，引进的数量更是庞大。从来源上来分析，西域的胡人既有直接从粟特本土前来的，也有从突厥等地间接而来。

二、粟特胡人对中原各方面的影响

1. 粟特胡人对中原服饰的影响

粟特人在入华经商的过程中，在中原掀起了一股胡服的热潮，在文化影响中，服饰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在《旧唐书•舆服志》中载："永徽之后，皆用帷帽，拖裙到颈，渐为浅露。……则天之后，帷帽大行。中宗即位，宫禁宽弛，公私妇人，无复幂旃之制。开元初，从驾宫人骑马者，皆著胡帽、靓妆露面，无复障蔽。士庶之家，又相仿效，帷帽之制，绝不行用。……士女皆竞衣服胡。"[2]《新唐书•车服志》载："宫人从驾，皆胡帽乘马，海内效之。"[3]生动地反映了唐代宫廷乃至

叹调的伴奏不再是交响乐队，取而代之的是了一架小的立式钢琴，映衬了奥芬海默小范围的演唱对象---他的妻子，诗歌的诗意混合音乐的诗意彻底融化了凯迪•奥本海默，他们夫妇俩暂时忘却了生活的无趣，手挽手仰望着星空。盖因此，某些美国的乐评人从奥本海默的形象里解读出浮士德的意味。在歌德的著名诗歌里，浮士德是勇猛的，具有才华的，并且非常受女人欢迎。

约翰•亚当斯着力描写的另一个人物也非常有深意，奥本海默家里的女佣人帕斯。纵观全场，帕斯小姐非常喜欢朗诵不同的古典诗歌，例如第二幕的第二场她在看护小奥本海默时轻轻哼唱着《cloud flower lullaby》（云朵摇篮曲），舞台的另一面，基地内的另外两位科学家，罗伯特•威尔逊和杰克•胡波在讨论他们对实验的担心。随后基地的司令莱斯•格鲁夫与奥本海默把实验的时间定了下来，看似不相关的两个情景，在约翰•亚当斯的音乐笼罩下，有条不紊，毫不混乱。她哼唱的摇篮曲是一首传统的印第安乐曲，它讲述了风暴来临时刻，一个普通的自然现象。但此时起了一个很好的隐喻作用，诗句里（cloud flower云朵）暗指（mushroom cloud 原子弹爆炸后产生的蘑菇云），诗歌里的雷电闪光使观众联想核爆，诗意的（rain雨）的形象被描写成放射物的辐射。

帕斯的这首咏叹调很确切、很形象的隐喻了原子弹的实验情景，使观众联想到核爆的情景，最初的诗意感也荡然无存，这种气氛通过'第四度墙'真切的传达给了观众，由此舞台上的气氛更加压抑。

二、关于本剧的思考

原子博士在2005年首演时，并未获得如期的成功。在欧洲的制作演出时，进行了改进。为了表达阿拉莫基地整体的压抑气氛，导演芬妮•伍尔科克这个才华横溢的导演，把舞台设计成可以随意拼装的三层小楼象征着阿拉莫基地，这栋小楼有无数个小房间做成。饰演工作人员，军方宪兵，科学家的演员居于其中，根据需要他们从房间里走出来表演，或充当合唱队员；在舞台的正中央高高悬挂着一个原子弹模型，一个巨大的时钟显示倒计时，时针的滴答声敲击着人们的心脏，离核爆实验只有20分钟了，空气中散发着令人焦虑，压抑的气氛。

自本部歌剧2005年诞生，十余年的时间，几经作曲家和编剧努力修改，经受住了严格苛刻的业内人士以及商业演出的考验，作曲家约翰•亚当斯在对相熟的乐评人讲，对于此部作品，从最初的违约构思美国版浮士德，再到完善描写罗伯特•奥本海默的内心他做了很大的权衡，但在艺术上没有做任何的妥协。2008年，约翰•亚当斯的《原子博士》被美国格莱美音乐节评为本年度最佳古典音乐大奖，这就是对歌剧人最大的褒奖吧。

注释：

1.The manipulation of time perception in john adams' s doctor atomic/Robert warren lintot.

作者简介：

张灿毅，聊城大学音乐学院 讲师。

民间都流行胡服，女性群体头戴胡帽，身着圆领束紧袖口的胡服，脚穿靴子，十分风靡，很受欢迎。

西域胡人的服饰在乐舞中也多有体现。他们的装束是：虬须卷发，深目高鼻，胸宽腰细；发束带，身着圆领紧身窄袖衫，下着裙而紧贴腿，穿长袖皮靴，每个人各踩在一小圆毯上，双人对舞。左右舞者舞姿造型不完全一样，左边舞者侧身回首，左脚站立圆毯上，右腿提升后屈，左手微微上举，右臂曲至头顶；右边舞者右脚立毯上，左腿前伸，右臂上曲至头顶合拢。左右舞者左右对称，身姿变幻。两人均手举长巾，头带高扬，缨络横飞，发辫挥动，自如回旋，飘逸的裙带，回旋轻盈当空舞动，增加了“胡旋舞”的视觉感与审美感。四周布以卷云纹，舞者如同在云雾中旋转一般，增强了画面灵动飘逸的艺术效果，衬托了舞者热烈奔放的舞姿造型。[4]

于阗是西域古王国名，在新疆的和田一带，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。于阗人有着中西合璧之貌：长而红的脸，黑色的浓髯、大浓眉，风度翩翩，头上卷发，缠着金色的高头巾。身体腰细，穿着一件锦缎外衣，围巾从颈部垂下，缠绕着肩部。腰下的腿与脚露在外面，脚穿高桶黑皮靴，腰间悬一柄短的弯剑。

2.粟特胡人对中原音乐的影响

粟特人还对中原的音乐有所影响。《旧唐书•音乐志》记载了京城教坊当中音乐歌舞和表演时，立部伎和坐部伎中，其间都安排有胡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乐人参与其中。唐玄宗时“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”每年考核，整个教坊供奉的梨园弟子有数千人，都严格按等级表演，也有不少胡人凭借高超的伎艺入选任职，皆为番工，总号“音声人”。太常寺礼乐之司的乐工仅限男性，并按照乐师、乐工的等级划分高下，以示伎艺的区别。唐代的曹氏是琵琶世家；乐师尉迟青是筚篥演奏家；尉迟璋是通晓古乐、笙、箫、琴、瑟等中原乐器的音乐家。

在乐舞的演奏方阵中，胡人的规模和乐工数量是十分强大的。前来中原的西域诸国乐工和舞伎，演奏的歌曲令人耳目一新，并且伴有急转如风、鼓乐齐鸣的西域特点。胡人依靠得天独厚的条件，使得他们以胡入俗，担负起了从宫廷教坊到官僚家乐的重要角色转换。在《唐才子传•康洽》记载中有：“康洽，酒泉人，黄须美丈夫也。盛时携琴剑来长安，竭当道，气度豪爽。工乐府诗篇，宫女梨园，皆写于声律。玄宗亦知名，尝叹美也。”康洽以西域俊美的形象和不凡气度赢得了长安人士的喜爱，所创作的乐府诗歌入乐融和声律，被梨园宫女争相传唱，连玄宗皇帝都对他刮目相看。龟兹乐工白明达演奏的乐曲《春莺啭》，旋律好似莺啼鸟鸣，后传入日本。在《唐国史补》中记载：“梨园弟子有胡者，善吹笛，尤承恩宠。”在官僚贵族家族之中蓄养的女伎男伶，称为家乐，实为百戏，家乐实为宫廷乐部的一种外延。唐朝还有很多种类的乐器都来源于西域，如弹拨乐器琵琶，拉弦乐器二胡，吹管乐器横笛、羌笛，打击乐器羯鼓等。

3.粟特胡人对中原舞蹈的影响

粟特人除了为中原内陆地区带来音乐以外，也带来了舞蹈。长安流行的舞蹈类型有胡旋舞、胡腾舞、柘枝舞，表演人员大多是从康国和石国而来的舞蹈家。

胡旋舞乐，是昭武九姓康国作为贡礼献给唐王朝的。胡旋舞是康国乐，以其疾速的节奏、连续的旋转，再配以艳丽的胡服来展现。“胡腾舞”与“胡旋舞”，皆为丝绸之路上东来的中亚乐舞，风格迥异：胡腾舞是来自于中亚石国的、以“腾”为特征的男子舞蹈；胡旋舞是来自于中亚康国的、以“旋”为主的女性乐舞。

敦煌石窟 220 窟的彩塑舞女造型及舞姿与苏步井乡的胡旋舞造型基本一致。宁夏盐池县唐墓石器刻造像胡旋舞，是一名胡人男子站在小圆毡上独自疾速地跳着舞蹈，没有乐队伴奏的图像。人物表情生动，体态轻盈，画面线条流畅，具有写实的效果，反映了唐代精湛的石刻雕塑水平。

4.胡人对诗歌的影响

在唐代，有不少诗人将音乐与诗歌结合了起来。唐代诗人王建的《凉州行》：“城头山鸡鸣角角，洛阳家家学胡乐。”生动描绘了胡乐在洛阳街头巷尾遍布的盛景。岑参《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》有云：“胡笳一曲断人肠，座上相看泪如雨。琵琶长笛曲相和，羌儿胡雏齐歌唱。”《梁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》：“梁州七里十万家，胡人半解弹琵琶。”李颀《听安万善吹筚篥歌》：“南山截竹为筚篥，此乐本是龟兹出。流传汉地曲转奇，凉州胡人为我吹。” 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是历史上有影响的著名边塞诗人，他写作过一首胡旋舞诗，描绘的是舞者立在红色莲花道具中，随着鼓乐节拍，莲花缓缓张开，舞者开始起舞。胡旋女身穿质地薄软、金丝花钿绣边和紫红色的缨络式紧身窄袖绸衫，舞女曼妙的身姿与矫健刚劲的舞姿形成了对比，边塞乐舞意境浓郁。诗人们看到长安的胡人们擅长乐舞，纷纷提笔为其写诗纪念，赞叹他们伎艺超群，表演精彩。

三、总结

随着中亚地区并入唐朝的统治范围，越来越多以粟特人为代表的西域胡人来往于丝绸之路的通道上，成为了推动东西方艺术文化交流中一股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。从历史发展上来看，粟特地区受到周边国家和民族兴衰的影响，西域独特的音乐、舞蹈形式经过往来使节和粟特商人传播到长安地区，对唐代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利用出土文物、壁画、古文献等史料对粟特胡人为代表的西域胡乐、胡乐人进行研究，进而延伸到丝绸之路一带的音乐形态、音乐体裁，深度挖掘从汉代以来的胡乐发展演变情况。唐代音乐形成和胡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胡乐对中原的贡献也是不可低估的，体现在具体的乐谱、乐器、乐人、乐律、音乐理论著述方面。丝绸之路开通至今，中国的固有音乐受到外域的多重影响，西域胡乐与雅乐、俗乐三足鼎立，胡乐作为外来传入之乐，极大地丰富了唐代的音乐，使之具有兼收并蓄的多元文化特征。

注释：

1.毕波.《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》[M].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1.

2.刘煦等.《旧唐书》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.

3.欧阳修、宋祁.《新唐书》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.

4.薛正昌.《隋唐宁夏粟特人与丝绸之路》[J].《石河子大学学报》，2015（10）：22.

作者简介：

刘硕，女，（1988~），江苏扬州人，上海音乐学院2016级中国古代音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，研究生第一党支部博士支委。